

文物大家朱家溍的故宫缘

朱家溍(1914-2003),字季黄,祖籍浙江萧山,生长于北京,故宫博物院研究员,著名文物专家、戏曲研究专家、清史专家。1941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。1943年在重庆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,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科长、编纂等职务,负责文物整理、编目、陈列等工作。在其所著《北京闻见录》一书中,他回忆了自己与故宫结缘的经过,也让我们了解了故宫博物院最初的样子。

从一个参观者到故宫一员

1925年,故宫博物院成立开放了。那时,我还是个少年,随着父母、哥哥、姐姐去逛故宫。票价银圆一元,是按照颐和园票价先例定的。当时的宫殿还保持着溥仪被赶出宫时的样子:寝宫里,桌上有咬过二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;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;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;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、佛手;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,都已枯萎;廊檐上,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。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。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,一尺多高的瓷人,有高贵的妇人,有拿着望远镜、带着指挥刀的军官,还有猎人,等等。桌上有各式大座钟和各种盆景……以上便是我对当时被称作内西路的那片区域的印象。

中路乾清宫、坤宁宫等都开着门,允许走进去,但三面拦着绳子,只能立在当中往左右看。坤宁宫,一口

煮肉大锅很是引人注目,西北角则显得有些神秘,挂着黑色幔帐。乾清宫东西庑,有几间开着门,那是陈列室,但看得出还有些原陈设家具(并非陈列品)也保留在原处。此外,还有内东路、外东路、外西路,亦都仅是参观宫殿而已。

北伐以后,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年间,故宫博物院有了变化,我这个参观者的文化程度也提高了一点,对陈列的文物有了兴趣。故宫博物院的票价由一元降到五角,内东路、外东路和内西路、外西路轮流开放,但中路则每天都开放。从这个时期开始,故宫博物院有了内部优待赠券。我的哥哥朱家济和庄尚严、傅振伦等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,我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,所以我有赠券,可以常来故宫。

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钟粹宫陈列的书画,那时每月更换陈列品两次。当时专门委员会每周开鉴定会,每星期一故宫博物院派人送一份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给我的父亲,这等于给我一个预习的机会。父亲每次开审查会回来,总会对着目录告诉我,某件真,某件假,某件真而不精,某件假但笔墨还好,等等。哥哥朱家济是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工作人员,每次更换陈列品,我哥哥总先告诉我,这次更换的有哪些名画。因为有这种机缘,所以故宫当时所展出的《石渠宝笈》著录的精品,我都有幸观赏过。

“九一八”后古物南迁,故宫博物院冷冷清清,我就没再去了。一直到1943年,故宫博物院保存在贵州安顺的一部分文物,即曾在伦敦举办

“中国艺术品展览”的83箱精品,于重庆中央图书馆临时展览时,在庄尚严的领导下,我参加了临时工作,晋唐宋元明清法书名画,又得以寓目一次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,马衡院长派我在古物馆工作。从此,我不再是参观者了。

难以忘却的故宫院庆

故宫在1925年10月10日成为博物院,因此,每年的10月10日便是成立纪念日。每到10月院庆必有新的陈列出现,记得有几年“院庆”,承乾宫被专辟为“清代珐琅彩瓷器陈列室”,咸福宫则被专辟为“乾隆珍赏物陈列室”。承乾宫前后殿共陈列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四百余件,真是珐琅彩的大观。现在在这四百多件珐琅彩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1931年9月18日,日军侵占了沈阳,之后侵略面积不断扩大。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到平津地区一旦成为战场,故宫所藏国宝就会遭到破坏,遂命故宫理事会做好古物南运的准备。到了1933年春,山海关告警,理事会正式决定古物南迁。

全面抗战期间,我在四川。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部在重庆海棠溪,马衡院长就住在院部。古物分别保存在:贵州安顺一处,由庄尚严主管;四川峨眉一处,由那志良主管;四川乐山一处,由欧阳道达主管。

1944年,日军侵略到独山,已经离贵阳不远。重庆院部派车将保存在安顺华岩洞的83箱珍品接运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,由安顺办事处主任庄尚严先生押运,并选择一部分运至重庆展览。马院长命我和王世襄兄参加这次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临时展览,以前我只是故宫的职工家属,到这时才实地参加工作,包括装车、押车、卸车、抬箱子和开箱整理,以及写说明、写卡片等。这部分展品就是曾在伦敦展览过的珍品,每件文物我都过了一下手,真是莫大享受。

未能回到北平的文物

194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20周年。这一年的8月15日,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。当时,我在故宫是借调的性质,我的编制还在粮

食部。抗战胜利的这一年,各单位都在准备复工,虽然这一年的10月是故宫博物院20年院庆的日子,但是分放在三个地方保管的文物须先集中到重庆,要做的事千头万绪,当然顾不上院庆了。

1946年1月,放在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的83箱文物由庄尚严兄押运到重庆。马衡院长事先在海棠溪附近向家坡借到贸易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,作为临时库房。院部的计划是分为三组,甲组由庄尚严为主任,管理山脚一带的库房;乙组由欧阳道达为主任,管理山腰一带的库房;丙组由那志良为主任,管理山顶附近一带的库房。

6月份,我将要随粮食部先回南京,于是到向家坡与庄尚严兄话别,盘桓了几天。文物箱当然不能无故开箱,所以我并未看到什么。白天,我们登山,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,可以远眺川江。晚上,我们边喝红糟大曲边聊天,因为快回家了,心情很愉快。老庄兄说:“胜利了,这一回东西装运回到北平,收进延禧宫和北五所库房,不用再装再运了吧。”我们满怀信心地都这样想,谁知后来事与愿违。

回到北平后,我从那志良兄的信中得知,我走后,9月份峨眉办事处的文物已全部集中到向家坡,到1947年春,乐山办事处的文物也全都运到了向家坡。最后,除石鼓被十辆汽车走川湘公路运到南京外,全部文物都装船顺流而下回到南京。

从1946年起,我开始在北平故宫古物馆上班,每日在库房编目,并向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,补充进陈列室。第二年,我接手了古物陈列所的清点工作。这一年(1947年)10月10日的新陈列,有在坤宁门东群房布置的郎世宁、艾启蒙的十幅画马,在钟粹宫书画陈列室布置的《兰亭八柱》《法书大观》、韩滉的《文苑图》、惠崇的《溪山无尽意图》等。这些新补充进陈列室的展品,除《文苑图》是南迁时正在照相室未赶上装箱,所以漏下了,惠崇的《溪山无尽意图》是接收于古物陈列所以外,其余都是从原藏处新提集的,包括冯承素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柳公权等所书的《兰亭八柱》,如果南迁以前发现这种稀世之珍早就运走了。

据《北京闻见录》朱家溍/著

达尔文是“拖延症”患者

有人认为,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有拖延症,在《物种起源》出版前的那些年,他除了抚养孩子,就一直游手好闲:在显微镜下解剖藤壶,养鸽子……他在《园艺年鉴》上发表了许多小论文,文章主题多为盐、并用桶绳和果树之类,没有篇文章与物种进化有关。

1846年10月1日,达尔文打开了一瓶保存已久的标本——十几只藤壶。这些藤壶种类奇特,形态极小,会在特定的海螺壳上钻洞。11年前,他在智利海岸附近的乔诺斯群岛上收集了这些标本。现在,达尔文打算解剖这些小动物,将它们辨认清楚,并写一篇论文。开始时,达尔文心情愉快,以为这项工作不会花太多时间。谁知,藤壶分类学最终占据了

整整8年时间

1854年初秋,达尔文终于结束了看似遥遥无期的藤壶研究。他在日记中语气沮丧地抱怨道,藤壶研究项目竟花费了他8年时间。他早就受够了需要眯着眼进行的解剖、费力劳心的绘图,迫切地渴望开展下一项研究。

根据另一份日记,同一天,达尔文“开始整理物种理论的笔记”。这些笔记就在桌子中央。他已经花了16年时间思索物种演变,不断完善自然选择学说,阅读生物学文献,思考收集到的关于野外适应性和变异的资料,提炼1842年完成的大纲和1844年拟好的草稿中的论点。

1859年11月24日,《物种起源》在伦敦出版。据《老年文汇报》